

当代中国农村研究

当代
中国农村
研究

收割城市

朱虹/著

的
女孩

——文化资本与打工妹
城市生活世界的建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农村研究·收割城市的女孩/朱虹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2
ISBN 7-207-06213-3

I. 收… II. 朱… III. 农民—农村—问题研究
IV. I771.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790 号

责任编辑: 安晓峰

封面设计: 于克广

当代中国农村研究 (一)

收割城市的女孩——文化资本与打工妹城市生活世界的建构
朱虹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 net](mailto: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区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5

字 数 600 000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213-3/C·1442

定价: 36.00 元 (全三册)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言

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离开村庄,像潮水般涌进城市、进入工厂,成为中国 25 年来社会巨变中重大的社会事件。在二元城乡结构、户籍制度等宏观社会结构的控制下,农民工进城的艰辛是有目共睹的:无良资方随意拖欠民工血汗工钱早就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针对城市暂住人口的各种的歧视性政策,20 多年来几乎每一个进城农民都在不同程度地遭遇过。农民进城的历程虽然充满危险和坎坷,但毕竟在打破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变革中,迈出了最具革命性的一步;进城农民与城市社会和国家长达 20 多年的直接互动,终于拉开了制度创新的破冰之旅,城市社会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开始发生由管理到服务、从歧视到公正的转变。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的普遍制度性缺失的现状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即将发生制度性的改善。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各种不平等的阻碍农民进城的制度性壁垒都将土崩瓦解。那么,亿万农民的现代化、城市化之路是否从此踏上康庄大道、一帆风顺?当外在的制度性枷锁被挣脱以后,农民将面对的是与自己的抗争——城乡文化冲突。

从落后边远的乡村跑到繁华昌盛的大都市,然后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文化震惊与困惑,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现代主义的叙事主题了。各种“纽约我来了或巴黎我来了”的欧美农民进城故事在上个世纪的欧美大都市不断上演。今天,传统农民遭遇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剧场刚从欧美谢幕,又在中国开始重新上演。故事发生的地点从西方移到东方,但进城农民遭遇完全一样的由文化冲突

带来的生存问题:在家乡所熟悉的乡音、所内化的价值、所相信的真理、所推崇的品位,在大都市逐一面临挑战与崩解的威胁。面对这种挑战农民们不是咱回去吧,就是努力让自己从外到内看不到一抹乡下人的蛛丝马迹。本文向大家讲述的是“广州我来了”——打工妹在广州的故事。

打工妹从小生活在农村,那里充满了乡村传统文化符号,贯穿着乡亲邻里和宗嗣家族待人接物、礼尚往来的互动原则,于是拥有着从小耳濡目染习得的乡村生活知识,这些知识让她在日常生活中得心应手、自由自在。当社会变革的洪流突然把她冲进城市的大门时,她背囊中所带的漂亮衣物,她的乡音、她的那些过去屡试不爽的处世原则,她所有拥有的生活世界在一刹那间崩溃了。她不愿意再穿那些曾经在乡下遭人嫉妒的漂亮衣服走在城市街道上;在向城里人问路时,乡音让自己感到羞愧;过去,在没有星光的黑夜中,她也能翻山越岭找到回家的路,而灯光明亮的城市街道却像迷宫一样让她总是迷失方向。在乡下,她能把五族里外、盘根错结的亲戚关系分得清清楚楚,但在城市,由陌生人组成的人际关系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她需要重新建构生活世界,一个全新的城市生活世界。

对包括“打工妹”在内的“进城民工”的研究的主流前后大致经历了下面三个阶段:一是关于民工潮的形成、特点、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影响的对策性研究;二是对农民工进城后,生存状态的描述性研究,三是从工业化、城市化的视野对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劳资关系等社会结构变迁与制度创新角度切入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问題。无论哪一阶段其研究的视角都聚焦在社会结构层面,而对微观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心理层面很少触及。其实,千百万农民工不管是短期在城市逗留,或者是像候鸟一样不断地来回于城乡之间,还是永久移居城市,他们首先面临的都是对城市生活的认知与

适应,为适应城市生活与新的职业身份他们必须抛弃熟知的乡村生活知识,进入再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固然是关键,但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却是每一个进城农民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内容和途径包括许多方面,我试图从城市文化学习的角度探讨农民工城市适应性问题。所以我的研究视角是:通过描述打工妹积累文化资本的内容和途径,展现她们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建构其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过程。

我的研究主要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比较适合在微观层面上对个别事物或特殊事物进行细致、深入和动态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强调对生活历史和生活片段进行研究,力图寻求一种对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进行解说的方法;质的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进行研究;质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我的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生活史和参与观察三大质性研究的方法,力图收集一个个“个案”、剖析一段段“生活片段”、描述一幅幅“生活场景”,然后拼嵌出打工妹的生活世界。

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全部来自于我在 2001 年到 2002 年前后历时一年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主要包括在 XK 厂以车间文员身份和天府酒家以服务员的身份进行的完全参与调查的手记和 20 个访问个案。

我是从 2000 年 6 月确定主题开始打工妹的研究,从开题、田野调查到资料分析和论文撰写的每一个过程都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指导,在此借论文出版之际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周晓虹教授。他多年来对我的学业和生活都给予了极大

的帮助。他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是我终身学习的楷模。

感谢南京大学的成伯清博士、翟学伟教授、风笑天教授、童星教授、张鸿雁教授,以及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谭深研究员为论文研究和写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指导;学姐黄茵博士、师兄朱强博士、学弟郑欣博士和学妹王琨博士、孙淑敏博士、史伟伟、张蓓、赵燕霞等为论文定稿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此一一表示我真诚的感谢!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宋林飞教授、张彦教授把我带入了社会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

我还要感谢为我的田野调查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所有朋友,他们是:接受我访问的打工妹们、天府酒店的老板刘先生、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颜文博士、广东省建筑设计院的石翰生所长、粤海环境工程公司的丁培贤董事长、广东长青集团何启强总裁、广东火电业总公司张郅志副总经理。

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安晓峰编辑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许尔兵编辑的帮助,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吴世敏博士,他不但在精神上鼓励我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还为我提供了撰写论文的手提电脑和全部调查经费,以及去剑桥大学访学的机会。他的厚爱我将铭记终生。

朱虹

2002年秋季初稿于南京大学南园

2003年冬季定稿于南京大学陶园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1

- 一、“打工妹”阶层的由来、发展与特征 / 1
- 二、学者视野中的打工妹 / 8
- 三、我的研究视角——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 11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14

- 一、理论基础分析 / 14
- 二、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 / 21
- 三、主要概念 / 24
- 四、田野调查的进入过程 / 27

第三章 城市对身体的形塑 / 33

- 一、从鞋袜的历程看身体的城市化 / 33
- 二、身体形塑的动力 / 36
- 三、身体形塑的主要元素 / 40
- 四、打扮身体知识的来源 / 51

第四章 语言的学习和城市话语符号的认知 / 59

- 一、粤语、普通话、家乡话——语种及其话语权的大小 / 59
- 二、家乡话、普通话、粤语的使用语境 / 71

三、城市词汇——话语符号的获得与理解 / 74

第五章 观念行为的城市化 / 77

一、婚姻、爱情与性观念 / 77

二、契约关系的接受与认同 / 88

三、时间观念、纪律观念与协作精神 / 91

四、业缘关系、科层制对地缘关系和差序原则的消解 / 93

五、城市礼仪——礼节、举止与隐私 / 99

六、对付复杂环境的应变能力 / 102

第六章 结论和思考 / 105

一、城市生活世界中的文化资本 / 105

二、文化资本和社会结构 / 110

三、结语：城市的乡下人和乡村的城里人 / 129

附录：个案 1~7 / 132

调查手记 / 175

参考文献 / 184

第一章 研究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离开村庄,像潮水般涌进城市,进入工厂,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流动现象。在这气势磅礴的“民工潮”中,流动中的农村女性,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被称为“打工妹”的农村年轻女性,因其多达相当于当地人口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数量,和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故事,形成一道色彩缤纷的社会景观。

一、“打工妹”阶层的由来、发展与特征

(一)打工妹阶层的发展历程

1. 19世纪末:打工妹阶层开始形成

许多人以为,打工妹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社会群体。其实,早在清末民初打工妹就开始出现。徐珂在《唐居笔记汇涵》中就有“在粤打工妹”的专门记载^①。在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生发展,尤其是轻纺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比如当时上海怡和丝厂就雇佣“创茧与拣茧的女工二百人,绳丝的女工五百人,刷丝的女工二百五十人,清理废丝以备供应市场的女工一百人”^②。在广东南海丝厂“均用女工”;杭州某针织厂“工人完全是女的”^③。作为中国近代工业龙头地位的纺织行业,

① 池子华:“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北京日报》2000年1月17日,第11版。

② 孙旒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

“天然”选择“打工妹”作为其劳动力。另外伴随城市的兴起与扩张,酒肆、茶楼、旅馆等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也为年轻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有城市有钱阶层家庭数量激增,导致需要众多的从事保姆、仆役等工作的家庭服务人员。保姆、仆人是自古就存在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是,民国以前,其中的许多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她们是被称为丫鬟而不是打工妹;民国以后,人口买卖被禁止,这些工作的性质并没有变,但是因为她们拥有人身自由所以就可以纳入打工妹的行列。另一方面,与城市的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村的凋敝——自然经济解体、兵灾匪患,乡村年轻女孩在没饭吃的生存重压下,轻易地就冲破了足不出户的封建观念的约束,像潮水般拥进城市。据统计,1913年女工约占产业工人总数的33%^①,1933年占48.7%^②,打工妹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崭新社会阶层。她们以女工阶层的社会身份登上了政治舞台,在罢工、游行等社会运动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出现在《青春之歌》等小说和电影之中。女工阶层也进入了学者的视野:1923年费孝通在其家乡江村考察的时候,对在农村的女工进行了着力描述和深入分析:“城市工业吸引农村劳动力,无疑这种人口流动对农村社区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挣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起了变化。例如,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件小事指出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根据传统的观念,丈夫是不伺候妻子的,至少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不能这样做。另外,丈夫不能毫无抗议或反击,便接受妻子的责备。”^③

①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② 罗琼:《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2. 1949年~改革开放前:打工妹阶层的解体

1949年~1952年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城市工商业的所有制形式还没有完全改造为公有制,打工妹阶层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生存空间。1952年到1957年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经济计划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城市和农村是相对开放的,城乡之间的迁移比较自由,平均每年约3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①。农村年轻女性进入城市成为打工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工厂属于公有制性质,相当大比例的打工妹获得新的社会身份成为国有企业的女职工。所以,这一时期打工妹阶层虽然还没有消失,但数量已大大减少。

1958年以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已经完成,城市从农村人口中招募工人完全属于政府行为。极少数幸运的农村女青年通过招工从农村到城市工作,她们的身份不是打工妹而是国有企业的女职工;与此同时,由于严格的城市户口管理和粮食供应政策的实行,农民不能自由流入城市,加上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的控制,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农民想到城市工厂非法打工的可能性都没有。打工妹阶层随之完全消失。

3. 改革开放以后:打工妹阶层的复兴与壮大

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包产到户”的实施实际上是把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变成农民的家庭经营,把集体生产单位还原为家庭生产单位。家庭经营的实行,是农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开始了人民公社的瓦解过程。1982年12月宪法规定,今后的乡镇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区域,实现村民自治,人民公社制度随之宣告终结。农村改革的直接

^① 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结果是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人多地少的矛盾从人民公社时的隐蔽状态中显现出来,并日益激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是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内在推力。另外,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比较利益差是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涌入城市寻求机会的外在拉力。

在城市,经济改革要困难和复杂很多,首先进行了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制度的改革,逐步达到粮油供应的完全放开;城市劳动就业制度也发生变革,20世纪80年代“二元用工”制度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许多国有企业开始自行招收农民工从事艰苦的工作。城市户口制度虽然至今没有打破,但身份证的实行为人口流动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单一所有制结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城市大量涌现,由于农民工比城市工更廉价,私有企业都更愿意把工作职位给农民工。这些制度改革逐步打破了阻碍农民进城打工的城乡壁垒。

改革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化的高歌猛进,第三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餐饮、环卫、百货商业、家庭服务等第三产业行业的兴起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中国的对外开放最早是从珠江三角洲开始的,由于依靠其毗邻港澳、海外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和特区政策的优惠,吸引大量外资涌入,以轻工、电子业占主导的“三来一补”外向加工型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大量而便捷的就业机会。在珠江三角洲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中,年轻女工大受欢迎。这是由四个原因所决定的:第一,根据轻工、电子业的生产特点需要心细手巧、有耐心的工人,女性比男性更具备这些品质。第二,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内在本性。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女性没有担负养家的任务,所以女工可以接受比男工

更低的工资,也就在职业竞争中比男工更有竞争力。第三,加工性企业常常需要根据订单加班加点地工作,只有精力旺盛的年轻女性能胜任长时间甚至通宵达旦的连续工作。第四,女性在男权社会长期受压迫,形成柔顺、服从的社会性别特征,容易被控制和管理,所以管理女工的成本远低于管理男工的成本。

在上述社会结构的变革背景中,打工妹阶层在消失 20 年以后,迅速复兴与壮大。

(二)打工妹阶层的主要构成与特征

由于至今尚没有见到在全国范围内专门针对打工妹阶层所做的定量调查数据与分析,因而难以获得关于打工妹的数量、职业分布等详细准确的信息。我只能从一些学者定性的和局部的研究成果中对打工妹阶层的特征进行大致的描述和归纳。

根据学者们对民工潮规模的分析,估计其数量在 8 000 万到 1 亿之间,再根据女性占农民工三分之一的比例推算,以及外出女性基本上是未婚的农村女性外出流动特点,可以大致估计出打工妹的数量在 3 000 万左右。其中,据保守的估计,1994 年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中至少有 400 万以上的外来女工。1996 年深圳市有 83.6 万打工妹^①。有学者认为有 300 万打工妹从事家庭服务^②。我通过对广州市餐馆数量的调查分析,估计在广州市餐馆当服务员的打工妹人数约为 15 万人之众。

打工妹阶层成员几乎来自全国各地,其中省内流动一般分布在广东、福建、山东、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的落后乡村。2001 年 9 月我在粤北的贫困区——丰顺县做过调查,该县 90% 以上的年轻农民都到广东的发达地区打工,其中女性占 40%。从珠江三角洲

① 冯小双:“进城:求生存,图发展”,《中国妇女报》1996 年 5 月 28 日。

② 谭深:“社会变革与中国妇女就业”,《浙江学刊》1994 年第 2 期。

的一些调查来看,外来女工以四川、湖南、江西为主^①。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在94.6万外来农村人口中,有22.8万湖南人。^②北京外来人口以浙江、河南、安徽、四川为主。云南、贵州、东北三省、陕西外出农村打工妹不多。

打工女性的平均年龄低于打工男性,绝大多数的打工妹从17.8岁干到24.5岁之后返回家乡。这是由于农村女性的结婚年龄一般在18~25岁,而结婚后尤其是生育后的女性大都需要留在家庭照料老人、孩子和打理农活。农村年轻女性的打工生涯因中国农村家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而被迫中断。有部分生育后的农村女性在孩子哺乳期后,离开农村重返城市、工厂跟随丈夫继续打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组对广东的调查显示,在工厂的打工妹中,初中文化的占68.1%,高中和中专的占10.2%。^③在城市从事服务行业的打工妹学历大都在初中以上,平均学历要高于工厂打工妹。

打工妹从事的职业主要有三类:

第一,工厂务工。在工厂打工是打工妹阶层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打工妹工作的工厂主要集中在沿海工业园区内的轻工、电子、纺织服装、玩具等加工型企业。她们中绝大多数在工厂车间流水线上从事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负荷大的、简单重复的劳动。

第二,在城市从事服务行业,主要包括以下工种:餐馆、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发廊的洗头妹、酒烟促销小姐、家庭保姆、走街

① 周大鸣:“珠江三角洲外来劳动人口研究”,《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5期。

② “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组:“打工与农村及农民发展”,《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组:“打工与农村及农民发展——湖南省嘉和县种水村调查”,《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

串户摆地摊或在菜场卖菜的小商小贩等;以上职业除个别高档服务场所外,从业人员几乎都是从农村来的打工妹。比如,在北京的安徽无为县的保姆就达 10 万人,全国估计有 300 万农村年轻女性在城市当家庭保姆;通过我在广州市的调查分析,广州餐馆的服务员基本由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组成,餐馆打工妹人数超过 20 万之众。

第三,从事色情服务等边缘职业。色情服务在中国属于违法行为,但其地下经营规模已达到产业化的程度^①。农村年轻女性是中低档次的地下色情场所从业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

打工妹的流动呈现这样的一些特点:打工妹基本上依赖血缘和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滚雪球”似地进入城市。有学者将这种迁移方式称为“连锁迁移”^②。她们首次离开村庄一般是由已在城市工厂打过工的男性兄长或同乡带领进入城市和工厂。结婚以后还外出打工的都是跟随丈夫。绝大多数打工妹和农村的男青年结婚或回到乡下或乡镇上生活;由于打工经历使她们中的一些人突破中国农村传统的通婚圈^③,与其他地方的农村打工仔结婚,到千里之外的男方的家乡落户。还有少数人与有城市身份的男人结婚,可以永久地留在城市。另外,有一些打工妹,她们不愿意和农村的小伙子结婚,但在城市又一直找不到结婚对象,她们的青春岁月在城市的打工生涯中慢慢地流走,当她们的乡下女伴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她们还在一次又一次地等待那个愿意娶她的城市男人。婚姻的搁浅,导致了许多大龄未婚打工妹继续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① 参见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 年版。

② 宋林飞:《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4 期。

③ 调查显示中国传统农村的通婚圈为 30 里范围内,五分之一的婚姻发生在 1 里以内,甚至是村内婚,五分之三的婚姻发生在 1~5 里之间。

二、学者视野中的打工妹

席卷全国的“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农民流动问题成为社会学界广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在女性主义兴起以及社会性别和平等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中,“打工妹”作为农民流动主体中,处于社会身份与社会性别双重弱勢的群体,必然成为社会学视野中女性研究的焦点。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关于打工妹的研究目前尚无专著出版,相关主题论文不足 20 篇,有两个课题组进行了专项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另外还有一篇硕士论文和一篇博士论文是针对打工妹进行的研究。

1993~1995 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谭深等人负责的“外来女工”课题,以问卷形式调查了广东珠江三角洲的 1 021 位外来劳工,其中 74.7% 为女性,25.3% 是男性,女工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外地农村的年轻打工妹,同时访谈了 30 位打工妹,另外还对打工妹的主要流出地之一的湖南省嘉禾县进行调查。课题的另一条线是通过对在北京市从事第三产业的 40 名外来女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并访问了保姆的主要流出地安徽无为县。这些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主要有助于了解中国当代农村外出打工女性的基本状况,对打工妹的群体特征、生存状态、流动过程、普遍心态等作了一定的描述与分析,并针对打工妹的权益保护、平等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议。^①

唐灿在《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一文中,描述并分析了打工妹因性别身份和就业身份而受到的双重歧视,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

^① “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组:“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劳工”,《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4 期。

度缺失,以及因就业差别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①

冯小双在《流动的效应与代价——北京市部分外来农村女性务工经商者调查报告》中分析了进入大城市分散从事务工经商活动的农村女性群体特征,认为她们在进城获得明显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代价的根源便是女性群体内部因阶层、地域等的不同而形成的利益及地位的差异。^②

谭深在《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及当地社会的关系》一文中,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的外资企业大量使用外地年轻女工的原因,揭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外来资本、外来劳动力与地方政府三者之间,资方占绝对优势。作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剖析外地女工之所以成为最受资方欢迎的“廉价劳动力中的廉价劳动力”的内在逻辑是,女性只在婚前工作,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她们精力最充沛的阶段;女性不担负养家的职责,所以可以接受低工资。^③

香港中文大学潘毅的博士论文,通过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所做的为期六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外资企业加工厂中的打工妹的工作生活与身份的变化。《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本: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一文是潘毅在其博士论文中十分出彩的一节。该文追溯了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在中国结合到世界经济体系里的情况下,如何被现行体制、资本主义和男权文化的势力所撕裂。揭示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如何面对强大的社会,以及身体的痛楚是如何在工厂中产生,展现了打工妹在统治体系的裂缝中所进行的身体政治的抗争。作者

^① 唐灿:“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② 冯小双:“流动的效应与代价——北京市部分外来农村女性务工经商者调查报告”,《浙江学刊》1995年第6期。

^③ 谭深:“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及当地社会的关系”,《妇女研究》1997年第1期。